

## 致力於國家的和平、民主和團結

### 一、創建中國福利基金會

日本投降，中華民族的解放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機。宋慶齡冷靜地認識到歷史的轉折，「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和任務。要解決和完成它們，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sup>190</sup>

這些新問題是，八年戰爭給中國造成極嚴重的破壞，廣大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沿海工業完全崩潰。這些創傷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治癒。再加上災荒和瘟疫，人民生活失望和赤貧中，看不到近期的希望。

根據這種情況，宋慶齡決定繼續進行「保盟」原來的工作，任務是致力於遭受戰爭創傷的恢復與建設工作。具體計畫是：

- (一) 國際和平醫院與醫學院工作（全在邊區與解放區）；
- (二) 十個托兒所與孤兒院工作（也在邊區進行）；

190 宋慶齡：《保衛中國同盟聲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四十八、四十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三) 援助貧病作家（在上海、重慶、昆明、成都進行）；

(四) 實驗農場與製藥廠工作（在邊區）。<sup>191</sup>

為進行這些工作，宋慶齡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發表的《保衛中國同盟聲明》中，宣告「保衛中國同盟自即日起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總會暫設重慶（不久遷往上海）。

同時，宋慶齡由王安娜等陪同，返回闊別了整整八年的上海。宋慶齡與孫中山度過多少難忘歲月的舊居——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號，在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時遭到嚴重破壞，已經無法居住。保險櫃中的許多珍貴物品損失殆盡，連極為珍貴的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婚「誓約書」也丟失了。她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申請住房。

蔣介石毫不掩飾對這位「不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忌恨心理，開始只撥給宋慶齡「一個矮小的房子」。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不少進步報刊和公正輿論的抨擊，紛紛為此事抱不平。直到一九四八年冬，蔣介石見自己的小朝廷面臨覆滅的危機，為向宋慶齡及宋氏家族討好，才親自下了一道手諭，把坐落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八四三號的一座花園別墅撥給了宋慶齡。從此，這座別墅就成了宋慶齡在上海的永久性住宅。宋慶齡逝世後，這裡辟為故居供後人參觀。

這座別墅原是一位希臘船長建造的。整幢房子的造型就像一艘輪船，有桅杆似的煙囪。

191 宋慶齡：《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報告》（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一百〇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艙樣子的假三層（由天窗辟成的閣樓）和上層、船舷般的欄杆和與甲板相仿的陽臺。東西兩頭下坡，像船頭和船尾。四周的牆壁呈海洋色——白中帶點極淡的藍色。整座別墅是占地六畝半的長方形院落。院子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後面是花園，四周有數十株終年蔥蘢蒼翠的樟樹。宋慶齡十分喜愛樟樹，這不僅因為它四季常青，而且氣味芳香並能驅蟲，有抗腐蝕的特點。它正象徵著女主人堅韌不拔為革命事業獻身的高貴品質。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中，宋慶齡團結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正義感的中外友人進行工作。開始時只有六個人，宋慶齡任主席，美國友人譚寧邦為總幹事，秘書王安娜、廖夢醒、凱卜爾和趙天佑，辦公室設在蘇州河南路外商頤中煙草公司大樓的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間裡，只能放三張雙人寫字臺。為開創這項事業，宋慶齡曾變賣自己的許多財產。

中國福利基金會開始時採用與「保盟」同樣的方式進行工作：「一方面讓中國的國際朋友們知道中國戰區和敵人佔領地區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醫療物資和其他捐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宋慶齡攝於上海。

助物資運送給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們，使朋友們和同情者的捐贈最有效地得到應用。」<sup>192</sup>宋慶齡還強調將仍然遵循「保盟」正確的傳統和原則，即「幫助中國人民使他們能夠自助」的原則，和「一視同仁的幫助」的原則。她指出：「由於長期戰爭造成的惡果，在中國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需要援助。因此我們按照這樣的宗旨去做，即哪裡需要援助，哪裡的人民在自力解決困難。我們的援助就到那裡。」<sup>193</sup>

宋慶齡的每次呼籲，都在國際朋友和海外僑胞中得到熱烈回應，也使一些邪惡的勢力受到震懾。

一九四六年，僑居在泰國的愛國同胞，得悉國內人民在飽嘗八年侵略之苦後，又遭內戰之殃，特創建「泰國華僑各界建國救鄉總會」，為國內的正義事業能取得勝利，為解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災民，開展募捐活動。所捐款項交由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何香凝轉回國內。但他們的愛國行動卻遭到泰國反動勢力和國民黨的阻撓破壞。一些熱心募捐活動者遭到毒打致死。反動派威脅「建國救鄉總會」領導人蟻美厚離開泰國境內，否則將被打死。一時烏雲翻滾，總會的處境異常困難。

正在這種維艱時刻，他們收到宋慶齡用「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寫的兩封親筆信，一封給總會，一封給——。信中熱情洋溢地褒獎了愛國僑胞為國為民所做的好事，並鄭重地寫道：

192 宋慶齡：《保衛中國同盟聲明》，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五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93 宋慶齡：《給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八十九、九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國內災民很多，希望多搞些米救濟災民。」僑胞們把祖國親人的來信，視為對他們愛國行為最有力的支持。大家含著眼淚激動萬分地看著宋慶齡那剛勁有力的字跡，連日來的鬱悶心情仿佛一下子全消失了，渾身充滿了力量，決定馬上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們再次闡明了愛國的動機，並當場宣讀了宋慶齡的來信。讀信時，全場肅然，在座的中外記者們流露出崇敬的神情，隨即報以熱烈掌聲。第二天，不少報刊報導了這一消息，稱「建國救鄉總會」的行動是「愛國行為」，「是搞福利事業」，總會就利用有利形勢，據理合法地繼續為國內籌款。<sup>194</sup>

## 二、「爭取他們應得的一份」

宋慶齡把福利基金會的工作重點仍放在支援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首先面臨的一場鬥爭，「是要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其他半官方團體所提供的國際救濟資金和物資中，為在戰爭中出力最大、損失也最大的解放區，爭取他們應得的一份」。她確定這樣的援助方針，是把實現孫中山遺願、建立新中國的全部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所以，她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全力支持共產黨。

早在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間，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期間，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曾多次



會見。雙方對抗戰勝利後的局勢及其發展前途的認識完全一致。宋慶齡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十分欽佩。她「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並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sup>195</sup>

中國共產黨也十分敬佩宋慶齡，並對她的工作給予的支持，寄予很大的希望。九月八日，毛澤東、周恩來在桂園舉行茶會，招待在重慶的各國援華救濟團體負責人。毛澤東致詞，「感謝各方人士八年來對邊區及解放區的諸多援助，並希望能繼續這種援助」。宋慶齡在講話中表示，今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在建設方面對邊區及解放區繼續予以援助。<sup>196</sup>

戰後中國形勢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上。是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還是恢復內戰、獨裁、貧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這種鬥爭在當時具體表現在爭奪抗戰勝利果實上，而在救濟工作上也有明顯的反映。宋慶齡堅決把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當作為新中國而奮鬥的組成部分，在這條特殊的戰線上繼續同國民黨作鬥爭。

為了爭取聯合國救濟總署（簡稱聯總）提供的物資，解放區也成立以董必武為首的「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一方面組織解放區人民進行自救互助，一方面同解放區以外的救濟福利團體，首先是中國福利基金會取得聯繫，接受國際援助。為此，該會在北平、上海設立了辦事處。馬海德是該會的顧問及與聯總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伍雲甫為秘書長及駐國民黨區代

195 宋慶齡：《追念毛主席》手稿影印，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三一九，文物出版社出版。

196 《新華日報》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表。他們到上海後就找宋慶齡，請她幫助開展工作。宋慶齡熱情接待，並答應要求，對他們的工作多方照顧和協助。<sup>197</sup>

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密切合作，與「聯總」及國民黨談判。本來「聯總」的救濟金和物資應有很大一部分是供給解放區的。但是該機構的某些人與國民黨相勾結，竟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救濟金和物資撥給了國民黨，而擁有全國遭受戰禍人口至少一半以上的解放區，只分到百分之二。<sup>198</sup>而且分給國民黨的那一份，並沒有用來為人民造福，而是大筆款項被國民黨官吏所貪污；物資則有的在黑市上出售，有的留作發動內戰之用。

宋慶齡意識到這些情況是爭奪抗戰勝利果實在救濟工作上的反映。她懷著極大的義憤，一方面向全世界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賄賂行為和欺騙伎倆，另一方面親自做「聯總」負責醫藥分配的美國人的工作，促使他們主持公道；同時，與解放區救濟總會的馬海德、伍雲甫等人同國民黨的救濟機構壟斷救濟款項、物資的企圖作鬥爭。宋慶齡除了向「聯總」爭取外援外，還利用「保盟」原來的關係和影響，直接向國際援助團體和世界人民呼籲對中國解放區和中國人民的援助。對於這部分過去一直由宋慶齡領導的「保盟」直接掌握的外援，國民黨政府也想插手。為此，宋慶齡又不得不與他們周旋一番。

197 伍雲甫：《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一百二十四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98 宋慶齡：《為人民服務四十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一百七十四頁；伍雲甫：《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載同一書第一百二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經過宋慶齡領導福利基金會艱苦的工作和鬥爭的結果，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內戰爆發前，中國福利基金會從上海、北平兩地，利用去解放區的飛機、船隻和中共地下交通線，向解放區運去一大批物資，其中包括許多全套的醫療設備，並且為了避免國民黨的阻撓，宋慶齡盡量安排國際友人負責押運。

在這次運送的物資中，有一批是提供給剛剛成立的新四軍蘇北國際和平醫院的。這座醫院所以能開辦起來，完全歸功於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日本投降後不久，新四軍蘇浙軍區部隊，為顧全大局，主動撤離了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回到了抗日老根據地蘇北平原，組成華中軍區（張鼎丞為司令、粟裕為副司令），並且著手在淮安湖心寺一帶籌建軍區直屬醫院，計畫包括七個醫療隊、二百多個醫護工作人員，能收治一千五百至二千名傷病員。但是，當時解放區的醫療條件、藥品和器械都極為困難。

宋慶齡知道這個情況後，決定盡力支援。她先派遣一位友好使者奧地利人嚴斐德到淮安，瞭解醫院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嚴斐德熱誠地對軍區衛生部長齊仲恒（內科醫生）和副部長李振湘（外科醫生）及陳海峰（華中軍醫第一後方醫院院長）說：「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經常讚揚解放區軍民抗日的功績，她對國民黨不抗日、專門反共打內戰很氣憤。她知道解放區軍民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一面作戰，一面生產的。她更知道解放區缺醫缺藥，她要盡力設法募捐或者想各種辦法支援解放區。你們有什麼想法和要求儘管提，我一定負責轉報孫夫



人。」<sup>199</sup>他們對嚴斐德一一詳細作了介紹，並如實提出了要求支援的物資。

嚴斐德回上海不久，即從宋慶齡那裡傳來了令人喜悅的消息：她全部滿足了軍區的要求，決定支援蘇北解放區一個有二百五十張病床，在當時來說是現代化水準的醫院的整套設備。這些設備共裝了七百多條大小船隻，分批從上海沿運河航行到達湖心寺。這批物資計有二百五十張鋼絲病床（其中半數為半睡半臥的搖床，是解放區戰爭環境中急需的裝備），還有很好的手術床、各種手術器械、顯微鏡、X光機、大批藥品、敷料、石膏綁帶和鋼絲夾板等；還運來了化驗室、手術室及病房急需的其他裝備物資；而且還有大批傷病員急需的營養食品；甚至連醫院內用的病歷紙和常用的護理用具也都配套運來了。真是無微不至，考慮周到。張鼎丞、鄧子恢在六月二十九日特地給宋慶齡寫了感謝信，代表全體指戰員衷心地感謝她的深情厚意。<sup>200</sup>醫院成立後，每月都向宋慶齡寫書面報告，以使她及時瞭解醫院醫療工作情況。

同時，宋慶齡知道解放區醫生很少，又多方物色，請到曾參加西班牙戰爭醫療隊的美國外科醫生薛爾茨，以及內科醫生、化驗室主任、高級化驗師和總護士長等外國朋友。他們在蘇北解放區，一方面進行醫療和輔助醫療技術工作，一方面幫助提高解放區醫護人員的技術水準，在經常受到國民黨飛機掃射的情況下，忘我地進行各種醫療救治工作。

蘇皖邊區的國際和平醫院也是在宋慶齡的關懷下籌建的。邊區政府主席李一氓得悉宋慶

199 陳海峰：《雪裡送炭——宋慶齡同志與蘇北國際和平醫院》，載《健康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200 《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影印原件圖一五三，文物出版社出版。

齡將派員赴該區籌辦國際和平醫院分院消息後，立即致函宋慶齡，提出了他們對醫院的設想，「希望和平醫院應有自己的新建築及其完全適合於醫院之全部設備」。為此，需建築費、設備費約法幣七千萬元。另外，還望宋慶齡甄選介紹院長、內外科及產科主治醫師、看護長，以及華中建設大學附設醫學院的院長。<sup>201</sup>對於這些要求，宋慶齡後來一一地給予了滿足。

當時，宋慶齡親自抓支援解放區的工作，中共上海地下黨派趙天佑在她身邊當助手。宋慶齡經常讓趙天佑通知地下黨負責人曹達到她的寓所商量工作。她還多次在趙天佑、王安娜陪同下，到地下黨借用的倉庫裡檢查藥械包裝，與王安娜、曹達共同研究，商量發運的數量和路線，並鄭重地對趙天佑等說：「這些物資運到解放區能救多少人的生命！這是多麼寶貴呀，你們要包好紮牢，不要中途損耗。」<sup>202</sup>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部隊對解放區由封鎖改為全面進攻，解放區承擔救死扶傷的任務隨之更加艱巨。宋慶齡便加緊對解放區的支援工作。

當時，因內戰激烈，蘇北國際和平醫院又遭到國民黨飛機野蠻轟炸，只得將醫院撤到魯南的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宋慶齡得知後，即特地致函蘇北邊區政府衛生部長兼蘇北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的齊仲桓，表示：「一俟一批急需物資到達後，我們仍將爭取把它們運送給你們

201 參見李一氓、韋慈和華西固（當時中共代表團駐滬代表）致宋慶齡的信，原件影印。載《永遠和黨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02 趙天佑：《她心裡想到的是人民——回憶在宋慶齡同志身邊工作的日子》，載《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和其他國際和平醫院。」<sup>203</sup>表示將繼續給予大力支持。

與此同時，在北方，宋慶齡委派加拿大夏利遜大夫押運一批物資到解放區。由於旅途勞累，進入解放區後夏利遜不幸去世。為紀念這位國際友人，邯鄲的國際和平醫院被命名為「夏利遜國際和平醫院」。

在這兩個中國命運決戰的時刻，宋慶齡深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所承擔的歷史重任，因此，十分關心他們的健康。一次，兩架美制軍用運輸機徐徐降落到延安機場，運到二百多箱藥品、儀器設備和醫療器械，堆起來猶如一座小山。隨著這些藥品，還有一封宋慶齡給黎雪的信，信中叮囑他說：物品中有些是奶粉和葡萄糖，從中抽出兩箱來，分給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央



一九四八年，宋慶齡在檢查運往解放區的醫藥器材。為了保證醫藥物資無損地運到解放區，宋慶齡經常親自檢查藥品的包裝。

。603。

為新中國奮鬥  
第五節 致力於國家的和平、民主和團結

其他負責同志；他們的健康並不是他們個人的事情，而是關係到中國革命的前途。

中共中央非常感謝宋慶齡的關心和幫助，並積極地協助她做好救濟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英籍華人陳伊范（Jack Chen）到延安訪問，周恩來接見並親切交談後，托他給宋慶齡帶去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回到延安已將一月，延安的朋友們都惦念著您，感謝您為解放區人民所做的工作。」接著，信中闡述了當時正在「向著和平民主進步」發展的國際形勢，指出美帝國主義及各國反動派「日益陷入孤立」，應加強中英兩國人民的合作，以孤立美帝國主義。為此，周恩來特把陳伊范介紹給宋慶齡，請宋慶齡與他討論如何與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團體取得聯繫，以有助於救濟工作的開展。

關於國內形勢，周恩來指出：「如果內戰繼續下去，蔣介石的武力再經過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區人民的武力將有可能與蔣介石的武力漸漸地處於平衡的地位。到那時，……我們會看到在蔣介石統治區，愛國的民主運動更加發展，經濟的財政的危機更加嚴重，人民的武裝抵抗運動也會更加在許多地區擴大，再加上上述的國際有利局勢——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因此，中國人民只要堅持和平民主獨立的方針，渡過這一歷史上的困難時期，光明勝利的前途一定會到來。」最後，周恩來說：「我們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願分擔您在這一歷史困難時期所遭遇的困難。我們相信您的努力絕不會徒然的。不僅解放區，全中國人民都會感到驕傲，因為有您這樣一個永遠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者。……請接受我及穎超的

敬意及關切。」<sup>204</sup>

這封來自中國革命聖地延安的信，給宋慶齡極大的鼓舞。信中周恩來對當時國內外形勢及其發展前途作了極其深刻的分析，這無疑會大大幫助宋慶齡縱觀五洲風雲，高瞻遠矚，把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做得更好。

當時上海地下黨也經常得到宋慶齡的幫助。一次，她讓廖夢醒送交給中共地下黨上海局負責人張執十三萬美元，張執一隨即將錢交到上海局書記劉曉、劉長勝處，作為黨的活動經費。<sup>205</sup>

一九四七年，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階段，解放區面臨擴大的轉折關頭，宋慶齡又及時地委託國際友人向共產黨提供十五噸醫藥物資，從而大大支援了解放戰爭。

在宋慶齡領導的福利基金會幫助下，解放區的醫療衛生事業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迅速發展起來。到一九四八年，在八個解放區中有了八個國際和平醫院、四十二個國際和平醫院分院，有一萬一千八百張床位，此外還有幾十個巡迴醫療隊，為當時的一億四千萬人口的中國解放區軍民服務。隨著這個國際和平醫院網的組成，解放區先後成立好幾個白求恩醫科學校，國際和平醫院籌辦了許多短期訓練班。到一九四八年，各地白求恩醫科學校一共培養了兩千多名醫務工作者，其中包括醫生、護士，牙醫、化驗員和藥劑師。

<sup>204</sup> 參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sup>205</sup> 張執一：《「爭取他們應得的一份」——記宋慶齡同志組織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給解放區募捐物資情況片斷》，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二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此外，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資助下，中國解放區成立了幾個製藥廠。這些製藥廠起初只能制生藥，後來由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援助和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勝利，物質條件有了改善，也能製造化學合成藥品了。中國福利基金會還對許多解放區的農場提供援助，如派出農業技術專家和贈送種籽、人工授精器、殺蟲劑等。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僅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中國福利基金會捐給中國解放區的捐款即達二十億舊幣，不包括其他醫藥物資和書籍等。<sup>206</sup>而物資的援助之多，難以統計。僅華東軍區一次轉移中，就用了五百名民工搬運了一天多福利基金委員會提供的藥品和物資。華北的一座國際和平醫院在轉移時，用了約一千頭牲口，花了兩天工夫才運走全部醫療設備和病人。

### 三、反對內戰，反對獨裁

為建立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新中國，宋慶齡一方面大力支援解放區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堅決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內戰獨裁賣國的政策進行鬥爭。她在兩條戰線上開展工作，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建立和平、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她所處的特殊地位是最有利於在這樣的兩條戰線上開展工作的。

順應歷史的潮流，選擇聯合並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奔向新中國，在人

生道路上，這是宋慶齡的第二次重大抉擇。

早在一九四一年，宋慶齡強烈譴責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的反共罪行之後，雖然蔣介石不斷對解放區挑釁，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但是，宋慶齡一直保持沉默，而把全部精力集中於戰災的救濟工作，為減輕全國人民的痛苦，爭取中國的早日富強而埋頭工作。同時，她也懂得，只有這樣，才能使支援解放區的工作，少受干擾。

在香港的何香凝曾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給宋慶齡、宋子文和孫科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們三位「向蔣先生苦言力爭停止內戰，一切問題以政治協商求得合理解決」。<sup>207</sup>

但宋慶齡對此信遲遲沒有反應。雖然她與何香凝在反對內戰的政治主張及愛國愛民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她決不會去「苦言」力勸蔣介石。因為她非常瞭解蔣介石這個人，對他早已不抱一點幻想；知道要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根本不可能的。對蔣介石只有揭露、譴責；同時多協助共產黨工作、團結人民群眾、制止美國援助國民黨等，多做這些切實有效的工作，以促使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垮臺，這才於民於國更有利。

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蔣介石最後撕毀停戰協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而美國國會審議繼續對國民黨政府予以軍事援助法案的時候，宋慶齡終於打破了幾年來的「沉默」，發表了著名的《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

國民黨的聲明》。《聲明》強烈譴責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大聲喊：「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凡是有人性的人都必須發言。」她結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詳細闡明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中國時局的主張。她把自己的主張歸結為三點：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並警告說：「國民黨應該立即執行這些任務，否則就要擔負掀起內戰的責任」；而「國民黨是不能在這種戰爭中獲得勝利的」。

同時，她向美國人民揭露美國的反動分子正在與中國的反動分子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向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幫助其擴大內戰的罪惡勾當。為此，她說：「我向美國朋友們呼籲，你們應當阻止所有的軍事援助，並幫助一個屬於中國人民的政府，來推動這樣一個運動。」<sup>208</sup>

這個聲明，在理論上是傑出地發展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政治上與當時中國共產黨及各個民主黨派的主張完全一致。在實踐上則由於宋慶齡的特殊地位，它在國內外引起了一系列極其強烈的反響。

七月二十六日，在香港的何香凝、李章達、黃藥眠、李伯球和陳此生等，首先通電全國熱烈響應。他們還致電美國國會和美國人民，指出宋慶齡的聲明「正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見和要求」。他們呼籲：「請你們本著美國人民優良的獨立和民主精神督促你們的政府，立即實行撤退駐華美軍，停止對華軍軍事援助。這就是你們最大的友誼和援助。」<sup>209</sup>

<sup>208</sup> 《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為新中國奮鬥》一書收入此聲明時，注為「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於上海」，誤。  
<sup>209</sup> 同上報，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八月二日，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夫人發表談話，贊成宋慶齡聲明，認為為著促進和平，美國應放棄軍事干涉中國的局勢，這是美國人民所歡迎的。與此同時，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美國《華盛頓郵報》、《聖路易環球民主報》等報刊，紛紛發表談話和評論，支持宋慶齡聲明，譴責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援助，主張撤退駐華美軍。

八月九日，延安中國解放區婦聯籌委會致電宋慶齡，表示對她的正義呼聲「解放區七千萬婦女衷心擁護，誓願為其實現而奮鬥到底」。<sup>210</sup>

此外，重慶工商、文化、學術、藝術、戲劇、新聞、律師和教育等各界人士史良、鄧初民等一百三十六人，為回應宋慶齡的聲明，聯名發出了《給全國同胞的一封信》；蔡廷鍇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也發表了聲明。

最有影響的是，羅斯福夫人為回應宋慶齡聲明在美國國內發起反對中國內戰、反對美國軍事援華的運動；她特地邀請宋慶齡和鄧穎超去紐約參加十月中旬在那裡召開的國際婦女會議。上海、北京、重慶、昆明、延安等全國各地的婦女團體和個人，為此紛紛發出函電，擁護宋慶齡、鄧穎超出席這次會議，並要求她們把中國婦女因內戰所遭受的痛苦與損失，以及迫切要求和平的願望，帶到國際婦女會議上去。

宋慶齡的聲明及由此而掀起的聲勢浩大的反內戰運動，給予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沉重的

打擊。他們惱羞成怒，竟然拒絕發放宋慶齡、鄧穎超出國參加紐約會議的護照，致使她們未能成行。

一篇個人聲明，能發生如此大的影響，在歷史上實屬罕見。

事實上，宋慶齡聲明實際發生的影響比表現出來的還要大。在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美國政府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停止批准向中國出口作戰用軍事裝備的許可證；九月二十九日，又發佈一項指令，暫停交付計畫中的一切軍用物資。

蔣介石不顧宋慶齡聲明中提出的警告，一意孤行，擴大內戰，終於應驗了宋慶齡的預言：他們節節失敗，到一九四八年，便瀕於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也陷於更加孤立的境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蔣介石在佔領解放區重鎮張家口後，利令智昏，在美國特使馬歇爾及司徒雷登的指使和導演下，召開了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通過「憲法」，企圖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合法化，孤立和打擊中國共產黨。但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由於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的抵制，這次「國民大會」的召開，不但沒有達到美蔣預期的目的，反而使蔣介石集團更加孤立。為挽回敗局，一九四七年秋，他們又根據「憲法」，演出「行憲（國大）」的鬧劇，聲稱要選舉正副總統，以便國民黨「還政於民」。他們妄圖利用宋慶齡的威望，散佈所謂「孫夫人在廣州參加國大代表競選」的謠言，以欺騙民眾。

宋慶齡對他們的拙劣表演，十分氣憤。她主張的是一九四六年聲明中提出的成立各派聯



合政府的真民主，而不是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假民主。所以，她在九月六月發表闢謠聲明，指出：「此種傳聞完全不正確，我並無任何從事政治運動以圖參加政府的意圖。此外，我想這種消息是在廣州發出來的，而我在廣州既不是『代表』，也不是正式居民。」<sup>211</sup>

宋慶齡的聲明和抵制「行憲國大」的行動，給予革命人民以很大鼓舞，推動國統區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和平民主運動更加高漲，再次給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反動政府以沉重的打擊。

#### 四、支援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蔣介石反動派倒行逆施，顛預妄為，廣大民主愛國人士對它完全喪失信心。同時，一九四七年以後，解放戰爭的形勢出現一個偉大的轉捩點：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作戰後，打退了蔣介石數百萬軍隊的進攻，已轉入全國規模的反攻。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使全國被壓迫人民歡欣鼓舞，也給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蔣介石卻在這時更加瘋狂地強化法西斯統治，連續頒發什麼「戡亂」動員令、撤銷政治協商會議令、宣佈民主黨派非法令，等等。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為團結自救，恢復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決心進一步聯合起來，擁護共產黨，打倒蔣介石。

早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不久，在上海的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李濟深等就打算籌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從內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們與宋慶齡商量。宋慶齡從結成共產黨領導的廣泛的反蔣革命統一戰線，以及有利於打倒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戰略策略的高度出發，支援他們的行動，並約李濟深在上海新雅酒家會面，宋慶齡在她的英文秘書盧季卿及其丈夫祝世康的陪同下赴約。見面時，李濟深向宋慶齡講述了籌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設想。宋慶齡當即表示支持，並鼓勵他要多發揮作用。

然後，李濟深就到香港具體著手組織「民革」的事宜。在籌組「民革」的過程中，當宋慶齡瞭解到國民黨將派特務去香港謀害李濟深時，立刻派專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範。<sup>212</sup>

與此同時，在美國舊金山的馮玉祥，也主張成立一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爭取更多的國民黨內進步同志及早參加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他派朱學範作為他的全權代表到香港聯絡。

李濟深在香港的活動相當順利。他串聯了何香凝、彭澤民、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李章達、陳其瑗、朱學範等人，醞釀後決定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孫中山誕辰紀念日，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在討論推舉誰擔當革命委員會主席問題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認為非宋慶齡莫屬。於是，彭澤民、何香凝、柳亞子、李章達、陳其瑗、李濟深等親筆簽名寫出一封《上孫夫人書》的密信，

委託朱學範與上海的宋慶齡聯繫，請她俯允擔任主席。信中指出國民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地表示：「我們以夫人二十餘年來一貫之主張為主張……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sup>213</sup>

朱學範當時任中國勞動協會主席。他通過勞協在上海的關係，請既在勞協工作、又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俞志英來港，托她把信帶到上海面呈宋慶齡，並且向她詳細彙報他們在香港的活動情況。在俞志英送信之前，宋慶齡已從別的管道知道了李濟深等人的計畫。她非常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表示全力支持。但對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問題，她有自己的想法。經過她縝密的考慮，認為以她特殊的身分繼續開展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當她徵求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時，中國共產黨表示完全尊重宋慶齡的意見，並由中共在香港組織的負責人章漢夫，向俞志英轉達了這個意見。<sup>214</sup>

很顯然，當時宋慶齡要在上海這個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而不是在香港）堅持反蔣鬥

213 原函影印件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一七二，文物出版社出版。

214 參見朱學範：《眾望所歸的引路人——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〇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爭，迎接解放，必須充分利用「孫夫人」的身分，才更為有利。如果參加公開反蔣的革命組織，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宋慶齡作出的這個決斷，是很正確的，充分表現了她作為一個政治家所具有的機智和敏銳的眼光。

朱學範、何香凝和李濟深等聽到宋慶齡和共產黨的意見後，都很興奮，把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對他們革命活動的支持，看作是推動他們前進的巨大力量，並對宋慶齡的深謀遠慮異常欽佩。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在香港正式開幕。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月，大會發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推舉李濟深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與蔣介石所把持的國民黨反動派徹底劃清界限。

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毫不妥協的抵制，對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熱情支持，再次表示了宋慶齡堅持革命、堅決進步、愛恨分明的原則立場。

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很快。一九四九年一月，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時，人民解放軍已經飲馬長江，直逼金陵城下。蔣介石終於被迫「引退」，李宗仁登上了「代總統」的寶座。李宗仁以為在美國的支持下，果真能與共產黨抗衡，重溫歷史上「南北朝」的舊夢。為此，他廣泛吸收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參加他的政府，以便在政治上築起一道抵制解放軍繼續南下的防線。用李宗仁本人的話說：這些黨派和人士「對我還友好，似乎不懷惡感。我若得他們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種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輿論，這樣共產黨就不得不放棄毫無意

義的把內戰打到底的目的」。<sup>215</sup>

宋慶齡是他們爭取的第一個目標。於是國民黨又在社會上傳播說宋慶齡將在國民政府中就職，企圖給她施加輿論壓力。宋慶齡對此立即進行反擊，於一月十四發表了《中國福利基金會主席宋慶齡的聲明》，指出關於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任職責的一些傳說，「是毫無根據的」，並進一步聲明，她正在以全部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sup>216</sup>

但是，李宗仁仍不死心，在一月二十二日鄭重其事地委派他的私人代表甘介侯手持他親筆信到上海去拉攏宋慶齡。信的語氣極為謙恭，說「蔣先生淩然引退，仁以基於個人對國家之責任，不得不出而勉維現局……，尤賴夫人出為領導，共策進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實現，國家人民實深利賴」；「並乞即日命駕蒞京，使獲隨時承教」。<sup>217</sup>

宋慶齡不為所動，穩如泰山，斷然拒絕了李宗仁的盛情邀請。李宗仁失望之至，哀歎道：「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盤，因為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願意回到國民黨冷冷清清的屋裡來了。」<sup>218</sup>認為宋慶齡不為所動，是因為看到「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這是李宗仁的主觀推測。就宋慶齡來說則是：第一，她深知（李宗仁也不否認）所謂

215 《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百三十頁，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216 《字林西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月，聲明簽署的日期是一月十四。

217 原件影印，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一七三，文物出版社出版。

218 《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百三十一頁，廣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蔣介石「引退」，李宗仁上臺，不過是舊瓶貼上新商標，依然沒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甚至政府的實權也仍然操縱在幕後的蔣介石手中。李宗仁只是個「二等傀儡」。第二，宋慶齡一貫反對在國共兩黨之外搞「第三種力量」，一貫支持共產黨，把救國救民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不僅在「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的時候是這樣，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的處境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如此。

宋慶齡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充分顯示了她那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高尚情操。

